

周著：「胡適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

張 朋 園

書名：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

著者：Min-Chih Chou (周明之)

出版：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1984

著者周明之先生是密西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的博士，早年畢業於臺中東海大學，現任職於普林士敦大學東方圖書館。在序文中，周先生說從中學時起就對胡適着迷，進了大學後繼續對胡適崇拜，幾乎讀遍了胡氏的大眾化著作，雖然不太瞭解胡氏的思想及其所代表的意義，總覺得胡是一個不為權勢所屈的英雄，是一個天生的 (Charismatic) 領袖，謙和有禮，具有巨大的說服力。當胡適逝世的時候 (一九六二年)，他還是一個大學生，漫步校園中，若有所失。以後至美國留學，經過一番自我調適，覺得胡適自大不實，所見於中國無益，因此對胡適有不良的印象。但是當自己更為成熟之後，對胡適的印象再度有所改變，認為自己低估了胡適所處的時代環境和所受到的外來壓力，因而三度修正對胡適的評價。

研究一個人物的思想與行爲，重要的是能設身處地去探討問題。研究胡適的人很多，能像周先生一樣以二十年時間去深入瞭解，且一再自我修正的，可謂僅見，這是我要介紹周先生大著的原因。

周先生是以提出問題的方式來說明胡適的思想與行爲，他一共提出了十一個問題：1. 胡適的幼年教育，2. 留學的意義，3. 為何從農學轉到哲學，4. 何以一度信仰基督教，5. 婚姻，6. 大同主義，7. 對中國政治的看法，8. 文學革命的意義，9. 對中國文化的態度，10. 研究古代典籍的目的，11. 五四時代人物的歷史透視。大體歸納起來，這些問題涵蓋胡適的教育背景，對傳統文化的態度，政治思想，學術思想等幾

方面。能够瞭解這些問題的癥結所在，不僅可以瞭解胡適，而且對胡適所處的時代也會有相當深入的認識。

先將周先生對這十一個問題的看法略為介紹。

幼年教育：胡適的幼年教育奠定了國學基礎，十三歲去上海讀書，又打好了英文的底子。胡適自幼就有反迷信反偶像崇拜的觀念，其思想上的進步，受嚴復、梁啟超的影響甚大，嚴梁開啟了他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認識和中國學術思想研究的方向。胡適自幼就有知識分子關心社會榮枯的情懷，「沒有社會那有個人」是胡適的想法。

留學：一九一〇年左右，中國的思想界已經肯定必須向西方學習，嚴復推崇英國為中國的榜樣，梁啟超稱道安格魯薩克遜民族的傑出。原先中國人留學大多去日本，後來轉向美國和歐洲，西方的自由平等令人嚮往。胡適雖然痛恨帝國主義，痛恨洋奴，但他是不反對留學西洋的。胡氏獲得庚款獎學金自是喜出望外，當然也抱着許多留洋後的憧憬。

從農學轉哲學：讀科學是當時的思潮，因為中國需要科學。但許多人實際上對科學沒有興趣，不得不中途轉學。魯迅、郭沫若從醫學轉入文學，蔣夢麟從農學轉入教育，趙元任從數理轉入語言，這一類的例子甚多，胡適從農學轉到哲學是不足為奇的。

宗教信仰：胡適十一、二歲時就持反宗教反迷信的態度，到了美國卻信了基督教，不久之後又將之放棄。解釋胡適信教的原因，第一，初到美國，人地生疏，信教可以得到慰藉；第二，胡適當時有崇拜西方文化的心理，信仰就是一種崇拜心理的表現；第三，胡適有中國文化的自卑心理。放棄基督教的原因是：第一，在美久了，對美國有了深入的觀察，情緒漸漸平靜下來，分析左近的事物，有的可以接受，有的應該拒絕；第二，胡適成熟了；第三，誠如 Robert J. Lifton 所說，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大多數是反西方的，胡不例外。

胡適放棄基督教以後，曾經批評基督教的不合理，指責麵餅即聖體的說法為荒謬，耶穌之死雖然偉大，但還是不如蘇格拉底。回到中國後，胡適指責傳教士不學無術，帶着帝國主義的色彩。他曾經參加反宗教的運動，但是卻支持傳教士的文化教育活動。燕京大學成立時，他曾經給予積極的協助。他認為傳教士的活動，有益於改良中國的風俗習慣。這兩種態度相當矛盾。根據 Anna Freud 的「兒童受壓制與仿效壓制他人的心理」，因為胡適對於中國的衰弱不競感到氣餒，只有把西方

人的一些觀念內化，責難他人，亦責難自己，如此才能釋去個人的無力感。

婚姻：胡適與半文盲狀態的江冬秀結婚，因此贏得了「舊傳統的楷模」稱譽。其實胡適對自己的婚姻耿耿於懷，頗為痛苦，此從胡氏的無後觀念，「沒有愛毋寧離婚」觀念皆可得見。

胡適的真正意中人是誰？唐德剛、夏志清都認為是陳衡哲，著者則以為是韋蓮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考據原原本本。（著者另有「五四時期思想文化的衝突：以胡適的婚姻為例」一文，載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頁一七七——二〇八）。

大同主義：胡適因為信仰大同主義而主張以不抵抗態度面對日本的侵略，時人為之甚不諒解。胡適留美時就有了大同主義的信仰，他參加了美國的大同主義聯盟。考其接受大同主義的原因，美國兩位總統，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威爾遜（Woodrow Wilson）均有所影響；前者提倡人道主義，後者提倡大同主義。他的老師杜威（John Dewey）的非武力學說亦有所影響，蓋其與墨子的兼愛非攻思想極為相近，胡適對墨子是很推崇的。

日本侵略中國，胡適曾經籲請國際性的和平組織來阻止，也曾警告日本不可欺人太甚，老子曾言，「天下莫柔弱於水，但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七七抗戰發生，胡適不得不暫時擱置自己的大同主義。

政治主張：胡適的政治信念也是在美國建立的，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要求實行民主政治。一個自由主義者是什麼樣的人，著者引 Bernard Crick 的定義說：自由主義者的期待太多，而不知當付出多少痛苦的代價。他要求代議政治，誠實政府，繁榮經濟，人人接受義務教育……然而有種種要求而不願與政治接觸。自由主義者往往高估理性的力量、輿論的力量，而低估政治情緒的存在及人性之傾向於剛愎自用。自由主義者參加種種的抗議活動，但厭惡政治常規，政黨政治。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由主義能實現嗎？顯然的，胡適必然會對中國的政治失望。

胡適最初並不太關心中國的政治，他對辛亥革命的反應是遲緩的。雖然他後來接受了共和，但認為中國尚無實行民主的條件。他譴責不成熟的革命是一種浪費。政治是漸進的，社會的變遷固然從改變觀念開始，但如果沒有環境配合，觀念亦無從實現，這是為什麼胡適主張二十年不談政治的原因。到了國民政府時期，胡適的主張有所改變，他要求實行民主政治。他說中國雖無民主政治的基礎，但正如兒童的學習一樣，從幼稚園開始，步步向前，必可從萌芽而茁壯。

文學革命：文學革命是為了教育的普及。文言文只是少數人的奢侈品，白話文

普及之後，人人都有接受新知識的機會。語言就是思想的表達，歐美因為新文學的興起而民族國家興起，中國亦當如是。

對中國文化的態度：胡適對中國文化有深刻的研究，對於儒道墨各家的思想都有一定的認識。但他的一般性著作，往往因為立場的需要，時而出現矛盾現象。對外國人講話，他必定稱道中國的文化；對本國人發言，則批評指責，甚而有打倒孔家店一類的情緒語句。此種矛盾，與胡適個人的情緒緊張 (tension) 有關係。在國人面前說中國傳統不好，是挫折感的表現；對外人自誇自炫，是一種思鄉病 (nostalgia)，是一種自衛，是一種自我的滿足。

研究古代典籍的目的：胡適的學術興趣在古典範圍，似乎與現實脫離了。為什麼作這樣的選擇？答案是：胡適的時代，中國貧弱，社會太不健全，生活其間的知識分子無不痛心疾首，唯有潛入久遠的典籍中，一則可以減少痛苦，再則認同於自己的文化。但是躲在象牙塔中只是暫時的平靜，沈浸於典籍更只是「白頭宮女談天寶」，舊時的光榮難於自我滿足。因此又可以說，這是無力感的結果。中國有許多知識分子因為痛歎研究文史的無用而走向革命，胡適是個漸進主義者，不會走向革命，他寄望於中國的改造，所以提倡科學。研究古代典籍，不過是駝鳥埋首的心情，求暫時的樂以忘憂。

五四時代人物的透視：著者在餘論中比較戊戌變法時代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代知識分子的不同，認為兩代有了明顯的差距。戊戌時代的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等，將學術與政治結合，得意時走向政治，失意時從政治退回學術。五四時代的人物對政治是疏離的，他們的批評文字帶着許多情緒性的語句，不願從政，遠離政治。兩代的差異如此，可以進一步說戊戌時代的人物批評傳統而附着於傳統，五四人物則批評傳統而遠離傳統。他們要改造傳統，因而提倡科學，唯有科學可以改造傳統。然而主張是不易實現的，因此他們的疏離感特別強烈。

以上大致是著者十一個主題的重要論點。本書着重於推理解釋，不做冗長的敘述。著者是以歷史學家常用的方法探討胡適的抱負、希望、憂患意識，以史料印證解釋，沒有架空的泛泛之論。著者同時傾向於歷史心理學方法的運用，時而借用心理學以了解胡適的內心深處，偶爾引用 Erik Erikson, Robert Lifton 等心理歷史學家的概念以支持自己的論點。雖然不能說就是一本心理歷史的著作，心理歷史的特長在本書中已有表現。

著者有幾點突出的見解，例如解釋胡適的宗教觀念的轉變，胡適的婚姻，對中

國文化的態度，是否受杜威經驗主義的影響，發前人之所未發，頗能引人深思。我尤其佩服著者指出胡適自幼即重視方法學，其與杜威的經驗主義哲學，是誰影響了誰，見仁見智，難有定論；要之，胡適原有自己的方法，經杜威的啟示而得到肯定，不當說杜威給了胡適經驗主義。這是很具有說服力的見解，希望周先生將這一個問題，寫成一篇有系統的論文，使讀者更能深入瞭解。

書中有一個見解似乎還有商榷的餘地，那就是胡適的疏離感。著者在第八、十、十一等幾章一再提起這一個問題。第八章的文學革命，著者說胡適對中國的社會非常失望，中國的家庭制度腐敗，道德、宗教有種種缺點，中國人迷信、懦弱、奴性重，因此他想用文學革命的手段來革除這些缺點。但正如易卜生(Henrik Ibsen)所著「國民公敵」一劇中的男主角一樣，胡適開出了處方，卻無人取用。這使他非常氣餒，當然要產生疏離感。第十章討論胡適的學術興趣，著者謂胡適所以要鑽進古代典籍，也與失望於中國的政治社會有關，只有在典籍中可以得到慰藉與寧靜。第十一章的餘論，比較戊戌及五四這兩代人物，謂前一代認同於傳統，後一代反抗傳統，後者的疏離感特別重。

根據 Melvin Seeman 的綜合觀察，疏離感的起因大約有六種：無力感(Powerlessness)、無意義(Meaninglessness)、無規範(Normlessness)、文化疏離(Cultural estrangement)、自我疏離(Self-estrangement)、社會隔絕(Social isolation)①。依照周先生的看法，胡適的疏離屬於無力感類，也就是氣餒的意思。

胡適是否對於他左右的環境感到氣餒，這是值得研究的。我們都知道胡適是一個漸進主義者。有此信仰的人，只要社會逐漸進步，就會感到滿意。即使社會不進步，他瞭解獲致進步之不易，也會作較長時期的等待，不因一時的失意而頓生疏離。在胡適的著作中可能有的地方表現了疏離感。個人真情的流露，常在非公開性的文字中出現。胡適的日記及書信多有感情流露之處。他的留學日記已經公開，未公開的日記亦可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中得見，只是殘缺不全而已。最近大陸印行的「胡適來往書信選」②內容十分豐富，是觀察胡適感情最佳的史料。我翻閱胡適的書信選，所得印象，不僅沒有疏離感，相反地，覺得他非常積極，在此略為引錄，並加討論。

胡適的一生，大約可以分為四個階段來觀察：第一階段，從一八九一年出生至

① Melvin Seeman, "Alienation Studies" in Alex Inkeles and James Coleman (e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Palo Alto, Ca. Annual Review Inc. 1975) vol. 1, pp. 91-124.

②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一九一七年二十七歲，是積極進取的時代；第二階段，從一九一七年二十七歲至一九三七年四十七歲，是胡適對政治及社會積極批評的時代，也可以說仍然是積極進取的；第三階段，從一九三七年四十七歲至一九四九年五十九歲，是胡適參與政治活動時期，個人的影響力達於最高層次；第四階段，從一九四九年五十九歲至一九六三年七十二歲，是晚年時期，流亡海外，最後定居臺灣，仍有批評家的雄心壯志，但影響力已十分有限。

周先生利用留學日記以觀察胡適的第一個階段，觀察深入，非常成功。胡適來往書信選未及引用，如以之觀察第二、三階段，應是最佳的基本史料。

先看胡適批評時期的基本概念。一九三六年元月間，胡適致函周作人說：

「我是一個好事者。我相信多事總比少事好，有為總比無為好；我相信種瓜總可以得瓜，種豆總可以得豆，但不下種必不會有收穫。收穫不必在我，而耕耘應該是我們的責任。」^③

早在一九二六年的時候，胡適就對丁文江說，他在中國的社會裏絕不「F frivolous」〔隨俗浮沈〕，「要立定了腳跟，咬緊了牙齒，認真做事，認真做人。」^④這一類的表示，隨處可見。

胡適為什麼不參加政府？種種史料顯示國民政府要拉胡適擔任職務，但是胡適都推卸了。推卸的原因似乎與疏離感無關。茲舉實例一二如下。民國二十年華北政務委員會邀請胡氏擔任政務委員，胡給李石曾的信說：

「千萬請先生代向政府方面聲明我不願參加此項政務委員會。我所希望的，只是一點思想言論自由，使我能够公開的替國家想想，替人民說說話。」^⑤

民國二十二年，行政院長汪兆銘約請胡適出任教育部長，胡未接受，他給汪的信說：

「我細細想過，我終自信我在政府外邊能為國家致力之處，似比參加政府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這一點獨立的地位，決不是圖一點虛名，也決不是愛惜羽毛，實在是想要養成一個無偏無黨之身，有時當緊要的關頭上，或可為國家說幾句有力的公道話。一個國家不應該沒有這種人；這種人越多，社會的基礎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間接蒙其利益。……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許我留在政府之外，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⑥

③ 胡適來往書信選，冊二，頁二九六。

④ 同上，冊一，頁四一二。

⑤ 同上，冊二，頁九五。

民國三十六年，蔣中正約他擔任國民政府委員，胡適以同樣的理由懇辭，他對傅斯年說：

「我因為很願意幫國家政府的忙，所以不願意加入政府。」^⑦

雖然一再推卸，蔣中正還有意推薦他競選總統，他當然還是不接受。

胡適不入政府，但並不反對他的朋友參加政府。他曾經對翁文灝、蔣廷黻等說，他們「出山要比在山清」，同時還希望他們發揮更大的效力，乃至於引導政府首長：

「我對於你們幾個朋友，絕對相信你們『出山要比在山清』。但私意總覺得此時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爭』的諍友諍臣，故私意總期望諸兄要努力做 educate the chief [教育領袖] 的事業，鏗而不舍，終有效果。」^⑧

由此可以了解胡適絕不疏離，不僅如此，他還關心着社會的榮枯。抗戰前的幾年，中國各方面頗有進步，胡適看到國家繁榮的景象，顯得很興奮，很高興，他給翁文灝的信說：

「我最近曾對人說，國家的進步退步都是依着幾何學的級數的。近十年的建設進步，愈來愈快，確有幾何學的級數之象。試想當初劉紀文造南京中山路之時，何等困難，連我這平日反對無為的人，在前幾年也曾發表『建設與無為』的議論，明白的反對那初期的盲目建設，認為病民擾民，不如與民休息。直到前年，我才稍稍轉變過來，去年在國外作文始明白的讚揚國內建設的進步。我的轉變也正是因為最近二三年中，人才稍多，計劃稍周詳，而成績之積聚稍多亦是一個重要原因。」^⑨

胡適始終密切注視着社會與政治的變遷。緩進主義者與激進主義者之不同，在於他知道成功的果實只會慢慢的出現，不會暴得巨大的收穫，而激進主義者稍有不滿，頓生疏離，要求隱退。民國三十七年時，局勢已經不堪收拾，胡適還對陳之藩說：「別說緩不濟事，緩不應急」，天下沒有捷徑，還是抱着緩進主義^⑩。

上面所引胡適自己的話，或許還是不能證明胡適不是一個疏離者，我只是覺得這一個問題還有商榷的餘地。周先生引 Walter Kaufmann 的見解：「疏離感是人們生活的中心特色」，肯定人人都有疏離感，失之過於寬泛，似難為人接受。

⑥ 胡適來往書信選，冊二，頁二〇八。

⑦ 同上，冊三，頁一七五。

⑧ 同上，冊二，頁三〇二。

⑨ 同上，冊二，頁三五七。

⑩ 同上，冊三，頁三四五。